

## 寻找英伦的神话： 《霍华德庄园》中的“英国问题”和国民性

纳 海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福斯特小说《霍华德庄园》文本和相关历史材料的细读，仔细梳理了该小说与维多利亚时期反映劳资矛盾的“英国问题小说”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区别。《霍华德庄园》继承了“英国问题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社会关怀，同时又引入了对国民性的讨论。联系福斯特在他本人其他作品中对意大利和东方的想象，本文认为福斯特对“国家”和国民性的分析是他为“英国问题”这一概念所引入的新的内涵。福斯特借德国思想家施莱格尔兄弟之名，塑造了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施莱格尔姐妹，特别是姐姐玛格丽特这个人物，从而含蓄地指出，受经验主义和拜金主义影响的英国中产阶级需要放开心胸，借鉴德国思想中对至真至善理念的追求。从这一角度来看，福斯特拓宽了“英国问题小说”的外延。

**关键词：**福斯特 《霍华德庄园》 英国问题 国民性 施莱格尔 神话 联结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7)04-0014-13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 100871

**Title:** To Search for the English Mythology: *Howards En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Forster’s novel and the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reby establishing *Howards End*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 The essay first places the novel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provided especially by such works a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and C. F. G. Masterman’s *Condition of England* and seeks to know what the “condition” in the turn-of-the-century England exactly was. The house Howards End, in this light, is a symbol of the link between the nomadic urban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based on land. The essay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house and its inheritance. Finally the essay interprets Margaret as the rightful inheritor by associating her with some key ideas of her German Romantic namesake, the thinker Friedrich Schlegel. By invoking Schlegel’s conception of mythology, Forster incorporat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English national character—a persistent concern throughout Forster’s career—into 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

**Keywords:** E. M. Forster, *Howards End*, condition of England, national character, Friedrich von Schlegel, mythology, connect

**Author:** Na Hai, Assistant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nahai@pku.edu.cn

福斯特(E. M. Forster)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以下简称《庄园》)发表于1910年,小说围绕施莱格尔(Schlegel)、威尔考克斯(Wilcox)以及巴斯特(Bast)三个家庭展开。威尔考克斯夫人露丝(Ruth Wilcox)临死前,将祖传的产业“霍华德庄园”留给了只见过几面却相当投缘的玛格丽特(Margaret Schlegel),即施莱格尔姐妹中的姐姐。威尔考克斯先生亨利(Henry)和他的儿子查尔斯(Charles)却决定对这份遗嘱不予理睬。与此同时,亨利向玛格丽特求婚,并得到了后者的应允。玛格丽特的妹妹海伦在一次音乐会上认识了小职员伦纳德(Leonard Bast),其窘迫的境遇激起了海伦的同情,因此她决定利用姐夫亨利的力量来帮助伦纳德,不想却因亨利对事务的错误判断,使得伦纳德的生活更加潦倒。伦纳德夫妇与亨利的会面却揭开了亨利隐藏多年的秘密:伦纳德的妻子杰姬(Jacky)曾是亨利的情人。几经辗转,玛格丽特原谅了亨利,而伦纳德也与海伦产生了感情,并生有一子。

评论家们历来认为这部作品是关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问题小说”。比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福斯特》(*E.M. Forster*)一书中就曾指出,《庄园》是一本关于“英国命运”的小说,它那看似不甚合理的情节设计其实蕴含着一个核心问题,即“谁将继承我们的国家”(118)。这个观点并不新奇,然而深究它为何是这种体裁的作品,则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小说更多的维度。我认为《庄园》不是简单地将19世纪的题材加入了20世纪的材料,而是将“国民性”问题有机地融入到了“英国问题小说”中。作者反复暗示,“英国”本身就是小说人物之一,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优缺点,承担着独特的使命,也有自己的命运。“霍华德庄园”这个大宅本身就象征着英国,它将由谁来继承?为何威尔考克斯太太会将祖产留给几乎素不相识的玛格丽特?伦纳德在这个故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理解《庄园》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如果说《庄园》是“英国问题小说”,那么它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究竟是哪些?它毕竟与19世纪同类小说相差将近六十年,英国已经从工业化刚刚迈上正轨的维多利亚时代转变为现代化早期的爱德华时代,二者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绝不相同。但它毕竟还是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小说”的传统,那么《庄园》中有哪些“基因”能让我们辨识出它的来龙去脉?它又在这些基因的基础上产生了哪些新鲜的特质,令这部小说与众不同?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 什么是20世纪初的“英国问题”?

“英国问题”一词来自卡莱尔(Thomas Carlyle),用来描述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各种危机之后,社会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尖锐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方面。新兴的技术使得大批原来依靠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旧式工人面临失业,而大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的兴起,又吸引了大量原先依靠土地生存的农业人口进城,使得工人的工作环境、工资水平、卫生医疗等各方面矛盾日益突出。激进的思想家、社会学家玛提诺(Harriet Martineau)曾经写作各类中篇小说,专门用来讲各种政治经济学原理,称为《政治经济学例解》(*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汇集成册达九卷之多。这些例解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入手,用理性的方式分析产生社会问题、特别是劳工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的途径,也是“问题小说”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的运转不能全部放归市场,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应该担负起关怀劳工阶层的责任。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写作的三部小说《西伯尔》(*Sybil*)、《康宁思比》(*Coningsby*)和《坦克雷德》(*Tancred*)分别从经济、政治、宗教等角度阐释了他颇具浪漫主义情怀、提倡各阶层同情互爱的社会思想。迪斯累利、狄更斯、盖斯科尔夫人等人均从不同方面讨论了英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境遇,“英国问题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便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因此这个题材本身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卡扎米安(Louis Cazamian)将这一大类小说统称为“有着社会命题的小说”(novel with a social thesis),并认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这些作品是“个人或社会想要改善社会关系的积极明确的努力”(5)。

《庄园》的创作背景则是20世纪初期,英国已经从工业化初级发展到了金融资本、海外资本均很繁荣的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的总体财富大大增加,穷人的生活状况也较六七十年前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特别是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英国的社会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土地不再像维多利亚时期那样是社会重要的凝聚力。到了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重心已经转向城市。与此同时,教育、土地税收、关税、医疗等各类问题也同样吸引了许多社会精英的注意。1906年英国自由党重新执政,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体现了大量有社会良知的人试图改善现有体制的冲动。改革的节奏在1908年之后更加急促,比如出台了1908年的《养老金法案》(*Old Age Pension Act*),以及1909年引起许多反对意见的“人民预算案”(People's Budget of 1909)、《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等(Searle 366)。

这些对社会问题关注的声音,影响着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一员的福斯特。正如罗森鲍姆(S. P. Rosenbaum)所说,《庄园》中大量出现的二元对立,比如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目的与途径、金钱与精神,都是布鲁姆斯伯里作家经常探讨的问题(438-88)。然而《庄园》首先是一部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小说。福斯特认为《庄园》比自己之前的所有小说都要宏大,那将是一部像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或者威尔斯(H. G. Wells)他们写的那种“英国问题小说”。这种社会责任感的直接来源,或许可以追溯至1903年创刊的《独立评论》(*Independent Review*)。这个月刊最初由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狄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等福斯特在剑桥时期的师友创办,所宣扬的主要是自由的政治社会思想。在月刊第一卷开篇匿名作者指出,财富分配、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教育资源等问题是目前社会面对的急切问题,是本刊的焦点。在可查到的第一、二卷中(时间范围从1903年10月到1904年5月),有大量文章直接谈论社会现状和改革的方向。福斯特作为文学家,他的出发点自然不是通过写作直接影响社会改革进程,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他的作品表达了这样的冲动。在《自由评论》第一期的一篇名为《社会改革》的文章中,作者巴内特(Samuel Barnett)提出了“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对社会的构想(a conception of society),这是一切改革的原动力:

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正是对社会的构想,而这种构想目前还没有实现。政治家们和各个政党忙于各种阶级利益之争,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立场鲜明,却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日益膨胀的财富让人们做着帝国梦,但却没有人回答,什么是好的公民社会。有时我想,也许我们的社会改革正需要一个诗人……诗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愿景、一种对社会的想象,它可以团结起社会总体向善的力量。(32-33)

我认为写作《庄园》的福斯特，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社会改革冲动的“诗人”。然而诗人究竟能否有这样的社会担当？怀特（Leslie White）引用了福斯特发表于三四十年代的散文作为证据，说明福斯特并不认为艺术家的理念和想象力可以直接影响社会（43-63）。怀特认为，《庄园》所提倡的“联结”最终失败，是因为福斯特确信，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精神生活与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物质生活其实并不可调和，而“艺术”的价值，至多在于它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艺术家只能、或者应该站在俗世的边缘进行冷静地思考，是没有能力扭转乾坤的（47-48）。怀特所依据的大量文献写作于《庄园》问世后的20年，而他并没有意识到，在20世纪的头十年，社会改革总体趋势对福斯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期间，不仅有像《独立评论》这样的刊物出版，更有诸如马斯特曼（C. F. G. Masterman）全面考察英国社会的《英国问题》（*The Condition of England*）一书陆续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以及迪金森探讨社会进程的《现代会饮篇》（*A Modern Symposium*）出现。在《现代会饮篇》中，迪金森虚构了保守派、自由派、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诗人、科学家等人物，用对话的形式深入地讨论社会现状与改革的途径。这部书中的各色人物对社会改革持有不同见解：保守派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自由派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应按照自然的规律，而不能人为地规划，而自然的规律直接体现在商品贸易中；社会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物价和税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民主政治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腐败与落后。这其中也有一些非主流的声音，例如商人奥杜邦（Audubon）从虚无主义的角度解构了社会进步这一理念，认为一切的改革都基于“社会需要进步”这个理性的前提，但如果世界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呢？除此之外，书中也有诗人科里亚特（Coryat）的声音，然而他更像怀特所描述的那种置身事外，用审视的态度来品味生活的人，而作者迪金森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否则他也不会用尽心力来编织这个庞大的对话了。应该说，迪金森的对话正是社会改革冲动的诗意化表达，各种社会理念的冲击，正是迪金森这个“诗人”构想社会的一种努力。应该说，起码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福斯特对社会的看法应该是更像写作《现代会饮篇》的狄金森，而非狄金森笔下的科里亚特。

说到对福斯特《庄园》最为直接的影响，要数马斯特曼，他不仅在《独立评论》中屡发重要文章讨论国情与改革诸事，还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分期出版了《英国问题》一书，从商业社会、工人阶级、土地阶级、科学、宗教以及文学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系统分析英国社会现状（Lodge xiii）。马斯特曼认为英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中产阶级，它大致代表了英国当时各个方面的典型状态：中产阶级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在喧闹的大都市中耐心地忙碌着；同时他们不被现今相对富足的生活所蒙蔽，依然保留了那种原始的开拓精神（21-24）。他认为中产阶级拥有着一些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明确的奋斗目标、对智识的尊崇等。他甚至预见这样的时代，那时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品质的标准，他们将第一次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是那些世袭的贵族阶级和穷人都不能比拟的（75-77）。然而在不断积累的财富背后，分配严重不均是社会危机的来源：造成社会财富极大不平等的原因何在？英国的物质财富积累是否用到了国家福利上？英国是否还像伊丽莎白时期那样不断地繁衍人口，<sup>①</sup>也就是说国家是否在萎缩

<sup>①</sup> 关于人口缩减、人口政策问题，当时许多人都有所回应。比如《自由评论》第二卷中，艾利斯（Havelock Ellis）曾撰文《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未来》，表达了他对国民整体生育力下降的担忧。他认为生育力的减弱是和工商业过度发展分不开的。



(30-48)? 在马斯特曼看来,中产阶级虽然热心公益,然而却很少用宏大的视野来考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此时的英国,依然像半个多世纪以前迪斯累利笔下的《西伯尔》一样,是“两个国家”:社会的顶层和底层,生活状态完全不同,它们不仅是一个文明进程的两个阶段,其实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偶然交织在了一起(88-98)。

这些现象,同样也为福斯特所关注。他用文学想象的手法,在《庄园》中对社会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分析。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几乎都属于宽泛的“中产”:威尔考克斯父子拥有巨大的商业资本,稳坐“中产”的上层;施莱格尔姐妹虽然没有亲自投身商业运作,但却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其中少部分投资了铁路等实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书中处在“中产”阶级底层边缘的是小职员伦纳德,他生活拮据,衣着寒酸,但却整天想着靠读罗斯金(John Ruskin)等人的美学著作跻身社会上流社会。福斯特为读者展示的,正是一个以“钱财”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图景。就连书中最富有同情心和想象力、到后来被赋予救赎使命的玛格丽特都直言:“我们和威尔考克斯家族一样,脚踏‘财富’这个岛屿,它是那么样的坚固,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的存在……我感觉,整个世界的灵魂正是经济,处在社会底层深渊的人们缺乏的不是爱,而是钱”(Forster, *Howards End* 52)。

《庄园》对社会现实、特别是下层生活的关注是它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小说”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关怀主要通过小职员伦纳德表现出来。他的存在正如一个世纪以前布莱克笔下扫烟囱的童工,或者卡莱尔笔下散播着疾病的爱尔兰寡妇,是社会问题凝练的反映。在小说的第十四章我们得知,伦纳德是保险公司的一名员工。“我们猜他也许是来到城里打工的第三代,他祖上也许是牧羊人或者农民,是现代文明把它们吸引到了都市里。他是万千个失去了肉体的活力、又没有得到精神生活的人之一”(98)。施莱格尔姐妹与伦纳德的会面,缘于一次交响音乐会,一把雨伞的误会使得两个阶层对彼此处境的想象得到了真实的触碰。伦纳德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品味,故意说出德彪西、莫奈,《托斯卡》,然而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丢失的雨伞。当 he 从施莱格尔家取回雨伞后叙述者说:“这桩小事给这三个女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连她们自己都没料到。它就像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提醒着她们,现今的一切并不都是最好的,在财富与艺术的大厦下面,有一个还在为温饱而努力的男孩。他已经找回了他的雨伞并离开,但却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8)。

伦纳德的出现给施莱格尔姐妹、同时也给读者出了一个难题:个人如何解决这个由社会财富的不均分配以及文化符号的巨大感召力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福斯特似乎指责上层的中产阶级只对某些社会阶层和社会问题有“好奇心”,并没有具体的行动力。他说,“对于像施莱格尔家的那些人来说,伦纳德无非是一个有趣的生物,他们总想更多地见识一下这种人。对于他呢,施莱格尔姐妹生活在浪漫传奇中,她们只能是自己的角色,千万不要走到现实生活中来”(105)。伦纳德的境遇成了施莱格尔姐妹与别人在辩论会上的谈资:她们假定自己即将死去,身后留下百万英镑,应该如何处理这笔钱?有人认为,应该帮助伦纳德改善他的生活,但不应该直接给他钱;而玛格丽特却认为,只有给他一笔相当的财富,才能彻底改变他的生活:“直到社会主义实现之前,富人应该给他们钱,因为钱是构造文明的经线,不论纬线是什么。想象力应该建立在钱的基础上,靠钱来实现,因为它是这世界上第二重要的东西”(108)。

然而“纸上谈兵”并不是福斯特对中产阶级的全部批评。他似乎同时暗示,一旦中产

阶级真的试图将他们所谈的理论付诸现实生活，试图做出某些改变时，也许只能让事情越来越糟。施莱格尔姐妹听从了威尔考克斯先生一句不经意的话，劝说伦纳德离开了原本效益不错的公司，使得他原本就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又遭到损失。然而当海伦向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威尔考克斯先生问责时，他对海伦说：“我给你一条建议：对穷人不要那么多愁善感……文明不断前进的过程中，鞋一定会在某些地方破掉，但别以为任何人应该负责。这世界上总有穷人和富人，从来如此，以后也将这样下去。”对于她们姐妹的冲动，威尔考克斯的话令人深思：“你们可以尽可能地投给慈善事业，但千万别想着社会改革这么荒唐的事……这世界上原本没有所谓的‘社会问题’，除了一些想着靠它生存的小记者”（163）。此处，福斯特的主张恰好暗合了马斯特曼在《英国问题》中所描述的英国上层社会，即“征服者”，那些垄断着大量资源、主宰着英国社会命脉的人。马斯特曼认为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对现实的正视：“他们征服了世界，得到了世界；他们被繁复、奢华的生活所笼罩，没有什么多余的精力去考虑社会的秩序问题。他们愿意随心所欲地做些慈善，却没有雄心大志搞社会改革。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对别人的工作加以修改，干涉，甚至破坏，却不能提出任何措施去解决人民所面临的问题”（60-61）。

通过伦纳德这个小人物，福斯特勾勒出 20 世纪初英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各个层次。资本家威尔考克斯虽然实干，精明，也因此得到了玛格丽特的承认，但却缺乏仁慈的心；以伦纳德为代表的下层中产者虽然有向上的文化自觉，但限于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经济地位，不可能有远大的胸怀和见识。“继承这个国家”的任务因此也就落在了玛格丽特身上，她经济独立，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对社会问题敏感，愿意承担责任。因此，威尔考克斯太太将霍华德庄园留给玛格丽特——这看似荒诞的中心情节，其实是建立在精准的社会分析语境中的。接下来我们需要搞清“继承庄园”这个情节与本文的社会背景有何具体联系，以及为什么“霍华德庄园”成了英国未来的象征。

## 土地、宅邸与英国的未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乡村逐渐失去了社会重心的位置，乡绅阶级的地位也已被城市中产阶级代替，不再是社会权力的主要承担者。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土地的依恋日益稀薄。马斯特曼在《英国问题》中专辟一章集中讲乡村问题，在他看来，“乡土的英国正急速地走向崩溃”。以前的农业人口逐渐失去了耕种的土地和劳作的愿望，农庄都衰败了。“农业劳动者不但失去了与土地的亲密接触，就连对大地深深的热爱也逐渐消失了。那是一种对一块仅属于他的土地的渴望，这种渴望长久以来维系着农业生活”（160）。造成乡土英国瓦解的，首先是经济因素。国外价格更加低廉的农副产品进口严重冲击着英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耕种所产生的效益越来越低，逼迫着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工业人口转型。据统计，从 1886 年到 1903 年，超过 500 万公顷的耕地不再被耕种，许多农村的土地成了城市富豪消费的地方，不再产出经济效益（Searle 176-77）。在农村经济衰败的背景下，文人们开始表达对土地、乃至对“地方”的眷恋。在《自由评论》出版的第一年，迪金森就撰写小文《汽车的时代》（“Motoring”），指出了伦敦的喧嚣使得人们不再能听到宁静大地的细语。他说，离伦敦 20 英里，有一片杉树林，这本来是一片充满

灵气的地域，“原本能够接受到自然的召唤”，“现如今只有很少的人能接受这样的召唤。偶尔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周围的水中洗浴，几个邻村的人不时路过，除此之外，这里已被遗忘和抛弃”（“Motoring” 578-89）。

威尔考克斯太太（露丝）以及她从娘家继承过来的霍华德庄园，在本书中象征着正在远离乡土的人们对土地的眷恋。霍华德庄园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主体，但它占据了一片坚实的土地，是生活在“旅行箱的文明”中的人与过去、与土地紧密联系的象征。当她与玛格丽特解除了一开始的小误会后，两人成了朋友。在一次聚餐中，叙述者谈到露丝无法与其他人搭话，因为无所谓的闲谈对于露丝来说“就像那些跑着的汽车”，而她则是“一小捆干草”“一朵花”（63）。与她那四处打拼、以大城市伦敦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丈夫和孩子们不同，露丝就像植物一样扎根于土地中。从情节上来说，露丝在小说中神秘登场，又悄然离世。叙述者说，“她似乎不属于这些年轻人，也不属于他们所拥有的汽车文化。她属于这所房子，属于这房顶的大树。她尊崇过去，以及过去留给我们的本能的智慧，那种或许只能拙劣地称之为‘贵族品质’的智慧”（19）。关于露丝这个人物，霍奇（Elizabeth Hodge）从这个故事的神话原型入手做了解读。她指出，《庄园》讲述的故事正是古希腊依洛西斯神话（Eleusinian Mysteries）在20世纪的翻版，露丝充当着神话中代表土地与庄稼的女神得墨忒尔（Demeter），而她在故事中的使命之一，则是寻找她的女儿、被死亡之神哈迪斯（Hades）掠去的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 42-46）。纵然福斯特的故事并不是每个细节都符合霍奇所描述的依洛西斯神话，但这个解读的意义在于，依洛西斯神话正是关于土壤、丰收、死亡与再生的叙事，这与福斯特通过霍华德庄园所代表的土地文明来试图解决英国的精神和社会问题的冲动，是大致相符的。

小说中许多关于“庄园”本身的情节就建立在土地文明与城市文明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比如，当玛格丽特向露丝谈起她们自己家租赁合同即将到期，必须离开居住了很久的威克姆宅（Wickham Place）时，露丝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她说：“如果人们不能死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那么这种所谓的文明难道没有问题吗？”在她心中，“城市是属于魔鬼撒旦的，那狭窄的街道就像矿山里的小巷道一样令人窒息。浓雾不会对城市的商品交易造成影响，但会使人的精神变得黯淡无光”（71-72）。这种将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在露丝去世之后变得明显起来。叙述者告诉我们，威尔考克斯父子并不打算真的按照露丝说的，让玛格丽特去继承霍华德庄园，这是因为他们父子并不能意识到这所庄园对于露丝的真正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这庄园无非就是一幢房子。他们并不了解，对于露丝，它是一种精神，而露丝其实为这种精神寻找了继承人。然而，进一步说，即使他们知道了露丝的意图，他们就会那样做吗？对于他们来说，‘精神’真的可以继承吗”（84）。对于以威尔考克斯一家人为代表的资本家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住宅对于他们，并不代表着现代人与他们的历史、祖先、土地之间的联系。玛格丽特与亨利婚后曾经为了在何处居住有过激烈的争论。亨利显然对于是否有个“永久的住所”并不在意，而这正是玛格丽特关注的焦点。当她听到亨利轻描淡写地说到将来可能搬入的房子时，她意识到：“婚姻并没能让她摆脱变动的感觉。伦敦的生活让她初次尝到了迁移漂泊的现代文明，它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人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沉重”（222）。

福斯特认为所有的住宅都是有生命的，并不限于霍华德庄园。当玛格丽特一家即将



搬出威克姆宅时，叙述者说，“房屋有它们自己死去的方式，就像一代代人一样，各自以不同方式离去。有人悲壮地发出吼叫，有人静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去了鬼城，而另外一些人——就像威克姆宅一样——他们的精神先于肉体凋零”（219）。这所房子的精神，存在于家具、绘画和书籍中，而这些正被一件件地搬走。由于玛格丽特答应嫁给亨利，这些物品得以暂时放到霍华德庄园存起来。此处，福斯特似乎暗示小说的后续发展，的确有可能按照露丝的遗嘱，让玛格丽特继承霍华德庄园。然而，玛格丽特到底是谁？她身上到底有哪些与露丝相契合的品质，让露丝从一开始就挑中了她作为霍华德庄园的继承人呢？福斯特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是否另有深意？

### 流入了德国血脉的霍华德庄园

《庄园》全书都贯穿着对“地方”的讨论。除了上文所述的以宅邸为中心展开的情节外，还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讨论了“国家”的概念。确切地说，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是作者具体考察的对象。作者在小说开始之际，就交代了施莱格尔三姐弟的身世。她们父母双亡，与姨母门特夫人一起生活，有一笔能让他们过上富裕生活的遗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家“原本不是纯正的英国人”，然而虽有着德国血统，却也不是那种“可怖的德国人”。他们的父亲思想保守，似乎更属于半个世纪以前的德国，是“黑格尔和康德的同乡，跟他们一样是理想主义者，常陷入幻想之中”（24）。当玛格丽特与露丝第一次展开深入对话时，两人也很快进入了对国家以及国民性的评论。玛格丽特说，“德国人总是在找寻美。他也许会因为愚笨而错过美，或许会误解美，但是他总是愿意让美进入他的生活”（64）。面对露丝所说的他的丈夫向来对欧洲大陆不感兴趣，玛格丽特答道，“撇开各种优缺点不谈，欧洲大陆总归对理念（ideas）感兴趣。它们的文学艺术中，有对看不见的事物（the unseen）的追求”（65）。

福斯特用很少的篇幅就对比了他心目中的英国与德国，呼应了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对自己国民性的探讨和反思。当然，“国民性格”作为写作的主题早已有之。18世纪思想家休谟（David Hume）在一篇小品文《关于国家性格》（“On National Character”）中就提到，较之地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德性因素（moral causes）是决定一个民族性格的最主要原因。休谟认为的德性因素则包括所有“能够成为人们行为的动机或理由，并使这些动机和理由成为一个人群生活中的独特习惯”的因素。然而休谟认为在他的时代，英国人并不具备独特的性格特点，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英国的政治体制“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行使权力的人群则包括了乡绅和商人；各种宗教情绪和体制也都能在英国扎根（119）。这是休谟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英国“宽容”精神的赞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世纪上半叶，鲍沃尔-李顿（Edward Bulwer-Lytton）、卡莱尔等人则对英国国民性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分析。鲍沃尔-李顿曾专门写作《英格兰与英国人民》（*England and the English*）一书，并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为了消除对英国人的误解，也许“自己人写自己人”是有好处的（55）。在他笔下，商业味道浓重的英国人已经很接近福斯特眼中的形象：诚实守信，独立，但却过于直白，对艺术缺乏鉴赏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英国人对于政治、哲学中创新观念的畏惧，这全是因为，英国是一个特别注重商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新奇”



也许并不利于人们在商业往来中建立良好的“信誉”(credit):“人们通常惧怕新鲜想法的冲击,因为这是对他们信誉的冲击。宁静的时代才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动荡的时代对于需要周旋在一群债权人中间的商人来说,意味着死亡。这就造就了英国那些抗拒变化的、坚实的中产阶级”(50)。另一方面,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工作伦理的主要倡导者,卡莱尔也曾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中专门讨论过英国的“国民性”。卡莱尔也意识到,尽管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但骨子里仍旧缺乏诗意的想象。但是他认为,对于言行流于浮华的上流社会,以及当时言必谈形而上学的英国思想界,英国人性格中的“务实”(practicality)恰恰是那个时代最为难能可贵的品质。他说,“我向那创作了伟大、悦耳的六音格《伊利亚特》的作者致敬,但我更要向那帝国的缔造者致敬,因为他所创作的是一系列伟大的功绩……功绩比言论更伟大”(162-63)。

对于国民性的思考贯穿着福斯特的文学生涯。他于1920年撰写了小品文《英国国民性点滴》(“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其中他谈到了人们印象中英国人的刻板与保守。值得注意的是,他举了一些例子用来说明英国人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克制和冷静的,不似法国人或印度人那般直接坦率。这些例子似乎说明英国人骨子里缺乏诗意和热情,然而福斯特继而指出,这与英国曾诞生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和湖畔诗人的事实不相吻合。因此他在文章中推断:“既然文学特性总是孕育在国民性中,那么英国人的天性里一定蕴含着隐蔽的火种。我们在英国人身上努力寻找温暖的那种共情、那种浪漫和想象力,虽然不易被发现,但我相信它们一定在这个国家的整体中存在,否则我们的文学不会有那么诗意的表达。英国人的心灵不是冰冷的,而是未曾发展健全的”(6-8)。文章的结尾,福斯特预言,随着中产阶级地位逐渐下降,工人阶级政治地位上升,英国人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面貌来。他说,“国家之间必须互相了解,而且要尽快了解,并且这种了解必须是民间的、没有政府干预的,因为逐渐变小的地球正把我们推向彼此”(15)。

可见福斯特描述国民性,并不是为了彰显庸俗爱国主义,其目的不是要抬高或贬低某一民族。《庄园》中,虽然作者对德国所贡献的思想和艺术抱有巨大希望,但他也列数了德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呈现的种种特质,并一一加以甄别。施莱格尔家族之所以来到英国定居,正是因为不满意德国的种种军事霸权和野蛮行径:“德国作为一个商业大国、一个海上强国、一个拥有着众多殖民地的国家,这些形象也许对别人有吸引力,施莱格尔先生自己却对它们敬而远之”(24)。“国家”这个概念在福斯特看来是一组相对固定特征的载体,而他希望英国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逐渐拥有最好的“特征组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福斯特从最早期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直到最后的《印度之行》,都在不断地思考英国应该向他人学些什么才能拥有更好的“特征组合”。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保守谨慎的英国人都因为受到了感性、热烈奔放的意大利的召唤,认识到倾听自己内心呼唤、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英国小伙子菲利普(Philip)的弟弟已经死去,弟妹莉利娅(Lilia)到意大利散心,却与当地的小伙子吉诺(Gino)陷入爱河并生下一子。之后她客死在意大利,因此菲利普两次前往意大利探望莉利娅与吉诺所生的儿子。在异国他乡他遇到了以前的好友阿伯特小姐(Miss Abbott),而后者恰好也厌倦了英国人那种“可怜的无私精神”、那种智性上的愚钝,以及那竭力维持的“体面”(76)。当阿伯特小姐第一次见到吉诺时,她无法把面

前那直率简单却充满父爱的吉诺与她脑海里那个“道德败坏”、曾经“勾引”莉利娅的男人联系起来，父爱的力量消解了“对与错”的哲学。叙述者说，“她领悟到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可怕的真理，即所谓的坏人也能够爱别人”（136）。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福斯特将他眼中的意大利文化所代表的、英国人所缺乏的直觉和想象力幻化为一扇能够看得见风景的窗户。正是由于寻找这扇窗户，露西（Lucy Honeychurch）才得以认识敏感、细腻的心上人爱默生（Mr. Emerson），逐渐摆脱了她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离开了原来的未婚夫塞西尔（Cecil）。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将英国社会放在东方背景下，用殖民的视角来考察了英国的国民性。总之，福斯特的主题之一便是让英国与别国文化产生碰撞，从而吸取自身所缺乏的营养，这与阿诺德一贯提倡向别国文化传统学习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庄园》中的威尔考克斯家族正是典型的“英国家族”，它强大、自信、勤劳，对物质财富进行不懈地追求，读者很难不把它与阿诺德笔下的“斐力士人”联系起来。而故事的另一中心是施莱格尔家族，特别是玛格丽特与海伦姐妹。她们热情、细腻，富于想象力，痴迷于文学艺术，反映了作者对德国人品性的想象。霍奇认为她们的姓氏“施莱格尔”会让当时的读者很自然地想起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思想家施莱格尔兄弟（34）。她们不仅和这对思想家兄弟拥有同一个姓氏，就连玛格丽特的内心独白都几乎是照搬了小施莱格尔的文艺批评著作《关于神话的对谈》。当玛格丽特第二次独自走进霍华德庄园时，她内心这样发问道：“为什么英国没有自己伟大的神话？……我们的神话无法赋予夏季的原野以生命，也无法命名天上的繁星。英国的文学仍然在等待着一个了不起的时刻——那时我们伟大的诗人将讲述这样的神话，或者更理想的是，我们将有千千万万个诗人，他们的声音将进入我们的日常语汇”（228）。这段突兀的内心独白，是福斯特借玛格丽特之口传达小施莱格尔对于神话的理解。我们需要回到小施莱格尔的原文去了解究竟福斯特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神话”在施莱格尔与福斯特这部小说的语境中的象征意义。

在整篇《关于神话的对谈》中，施莱格尔用的都是非常诗化的语言，只有几处比较明显地宣告了他的文学理念。他运用了类似于《会饮篇》的对话形式，设置了卢多维科（Ludovico）这个人物，后者认为德国当代文学的状况一言以蔽之也是“没有自己的神话”。关于新时代所产生的新神话，施莱格尔告诉我们，“它脱胎于灵魂的最深处”，“它必须是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具艺术感的，它将为那从古至今永恒的诗意提供温床，它本身更是一首永恒的诗歌，其中包含了其他一切诗歌的源头”（312）。施莱格尔认为创造一种新的神话的内在需求，向我们提示并证明了当今思想界的整体趋向，即对“理想主义”（Idealismus）的追求，而这则是人类为了找到自己的存在中心而不断奋斗的一种方式（Gestalt）。值得品味的是，施莱格尔所谓的理想世界，是需要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因此创造新的神话实际上是为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寻找表达方式。他说：“这种新的、起源于理念世界的现实主义，必将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因为诗歌正是理念与现实的和谐”（315）。

《关于神话的对谈》中出现了原始神话与新神话这样一些概念。在作者看来，原始神话是最原初的、诉诸直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自然表达，“它描述和模仿感官世界中最直接和最具生命力的体验”（312）。新神话则不然，它是人们努力进行创作的结果，是具有高度想象力的诗学作品。在《庄园》中，老威尔考克斯夫人露丝也许象征着原始神话的力量：她不善言谈，不懂辞令，并没有像施莱格尔姐妹那样浸润在德国文化之中。露丝对事

物所做的判断依靠直觉,然而她本能地对土地存有温情,本能地抵制威尔考克斯家族那种坚不可摧但庸俗无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福斯特投射了他对“以前的英国”的种种想象。正如怀特所说,露丝与其说是个人物,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是那些“看不见的品质”的具象化体现。她所馈赠给玛格丽特的霍华德庄园,则代表了“英国的文化遗产”,这座庄园本身成了一件艺术品,“象征着那些必须保留和传承的真理”(52)。除怀特外,奥尔森(Jeane N. Olson)也认为露丝是人类直觉的化身:“她的存在是飘渺的、想象的,令人难以琢磨,更加难以用言语表达”(350-52)。施莱格尔姐妹则完全不同,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注重理念与精神,但通过海伦这个人物福斯特暗示的道理是,改造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浪漫主义的狂热和激情,更需要着眼现实,从实际事物中去实现更为宏大的理想。

能够从露丝手中接过霍华德庄园的只有玛格丽特一人。虽然玛格丽特也像海伦一样,在威尔考克斯家族身上看到了商人的狭隘与俗气,但她很清楚,威尔考克斯一家正是英国发展的中流砥柱,是他们的实干让英国变得越发强大。在与伦纳德的交往中,她知道了亨利不光彩的过去,但她选择原谅,依然接受了亨利的求婚。玛格丽特将“联结”的使命看做对亨利的救赎,希望通过婚姻来“联结”不同的民族性中的可贵品质。婚姻就像彩虹:“它将我们生活中的平淡与激情联结起来。如果没有这种联结,我们都是无意义的碎片,要么当修道士,要么当野兽,就像两个从未联结起来的圆弧”。然而福斯特却将这种愿景打破了,因为亨利过于愚钝(obtuseness):“他从来都不会注意任何事情,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159)。<sup>①</sup>

玛格丽特召唤英国神话,因为她意识到了英国的现实一功利主义需要向德国浪漫主义借鉴。小说中玛格丽特不断地说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联结起来、将生活中的“诗性”与“散文”联结起来。从玛格丽特的“只要将他们联结起来”这句警语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她对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巨大信心。小施莱格尔借“神话”这一话题,所谈的也正是弥合理念世界与现实存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需的努力。玛格丽特曾说,是霍华德庄园让她重新燃起对英伦岛的热爱,因为它将实实在在的欢愉与那些感官不可捕捉(inconceivable)的快乐联结起来了。玛格丽特所提出的“不可捕捉”,如果按照康德的认识哲学,便是那神秘模糊却又在逻辑上必然存在的“自在体”(Dingansich)。在康德的哲学中,这种自在体不是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范畴,而浪漫主义却认为人类能够通过想象力达到这一层次。玛格丽特所谈的“联结”的终极意义,在于福斯特对于习惯了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英国精神的不满,他希望在那个投射了他许多理想、甚至是空想的哲学之乡德国找到答案。通过“联结”,通过“神话”,福斯特试图用浪漫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为英国的国民性找到合理的补充,从而成为解决“英国问题”的根本途径。汤姆森(Douglass H. Thomson)认为,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姻,反映了她渐渐放弃理想主义的理念,转而更加关注现实,进而说明福斯特对于以语言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122-34)。这个看法还算公允,但如果以此推论出玛格丽特对于形而上学的疏离是对德国传统的否定,就显得片面了。

<sup>①</sup> 原文: But she failed. For there was one quality in Henry...his obtuseness. He simply did not notice things, and there was no more to be said. 英文 obtuse 的侧重点不在于坚持己见,而是强调缺乏对道德、智慧与美的洞察力,缺乏想象的能力。这种洞察力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被比喻成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户,而露西对塞西尔的不满正是因为塞西尔缺乏这种洞察力,曾说他的房间中从来都没有这样一扇窗户。



然而作为一部充满深切社会关怀的小说,读者能够切实看到的“联结”也许是不同阶层人之间试图消除隔阂的努力。施莱格尔姐妹对伦纳德的境遇感到同情,希冀通过亨利的能力帮助伦纳德改善生活。在伦纳德遭遇工作与生活的双重打击之后,海伦曾寄钱给他,但是遭到了伦纳德的拒绝。小说的结尾,伦纳德在进入霍华德庄园时遭遇不测,也许意味着这种阶层间的联结最终的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斯特对社会改革的绝望。他告诉读者,社会阶层矛盾的弥合,并不是只靠富人的一厢情愿和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就能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庄园》秉承着《独立评论》中所谈及的主题进行了新的尝试:讨论教育、土地改革、生育政策等,是在呼唤人们更清晰敏锐地看到社会深层改革的必要性。此处引用马斯特曼在《英国问题》一书的结尾极为恰当。他说,英国目前的安定富强也许是一种幻象:“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争执,剑拔弩张,而穷人与富人之间也有着巨大的裂缝,国家的未来是岌岌可危的”(248)。由此可见,在《庄园》这部作品中福斯特延续了“英国问题小说”对社会问题展开剖析的基本特征,然而他不仅继承传统,还将“国民性”这个问题纳入到这个题材中,并且提出,对本国国民性的冷静考量和借鉴别国文化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更根本的途径。威尔考克斯先生的道德困境,不仅属于他个人,也不仅属于英国中产阶级上层,更是全体英国人共同的问题。“国家”这个概念在这部小说中成了一个隐喻,集中了福斯特对人类想象、理解、共情等能力的思考。□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nonymous. "A Plea for a Programme." *Independent Review* 1 (1903):1-27.
- Barnett, Samuel. "Social Reform." *Independent Review* 1 (1903): 28-38.
- Bulwer-Lytton, Edward.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0.
- Carlyle, Thoma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New York UP, 1965.
- Cazamian, Louis. *The Social Novel of England 1830-1850: Dickens, Disraeli, Mrs. Gaskell, Kingsley*. London: Routledge, 1973.
- 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 *A Modern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22.
- . "Motoring." *Independent Review* 1.4 (1904): 578-89.
- Forster, E. M. *Howards End*. New York: Penguin, 2000.
- . "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 *Abinger Harvest*. San Diego: Harcourt, 1964.
- .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London: Arnold, 1947.
- Furbank, Philip Nicholas. *E. M. Forster: A Life*. Oxford: OUP, 1979.
- Hodge, Elizabeth J. "The Mysteries of Eleusis at 'Howards End': Germ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king of a Mythology for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13.1 (2006): 33-68. Web. 4 Sept. 2016.
- Hume, David. *Selected Essays*. Oxford: OUP, 2006.
- Lodge, David. Introduction. *Howards End*. New York: Penguin, 2000. vii-xxviii.
- Masterman, Charles F. G.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11.
- Olson, Jeane N. "E. M. Forster's Prophetic Vision of the Modern Family in *Howards End*."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35.3 (1993): 347-62. Web. 30 Aug. 2016.
- Rosenbaum, S. P. *Edwardian Bloomsbury: 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Vol. 2. London: Macmillan, 1994.



- Schlegel, Friedrich von. "Redeueber die Mythologie." In: *Gespräche über die Poesie.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Band 2. Zürich: Thomas-Verlag, 1967-1975. 87-97.
- Searle, G. R. *A New England? Peace and War 1886-1918*. Oxford: OUP, 2004.
- Thomson, Douglas H. "From Things to Words: Margaret's Progress in 'Howards End.'" *Studies in the Novel* 15.2 (1983): 122-34.
- Trilling, Lionel. *E. M. Forster*. Connecticut: New Directions, 1943.
- White, Leslie. "Vital Disconnection in 'Howards En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51.1 (2005): 43-63.

---

## 作者来信

《外国文学》编辑部：

我的文章《“我”之生成的时间动因与系统性误认——解析拉康的〈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判定：一种新的诡辩〉》发表在《外国文学》2017年第3期。刊出前曾发给《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位编辑老师，征询其个人建议。由于对方的疏忽，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刊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10期（2016年12月出版）。因该刊实际出刊日在今年4月间，距贵刊第3期出刊只有一个月余，其间我始终不知我的文章已在该刊登出。经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编辑部协调，收录此刊的中国知网将于近期撤掉我的文章，该刊纸质版也将在下一期刊登撤稿声明并向作者致歉。为此给贵刊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于 洋

2017年7月7日